
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53

November, 1994

Guanyu Tuhuoluoren de Qiyuan he Qiantu Wenti
[On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the
Tocharians]

by
XU Wenkan

Victor H. Mair, Editor
Sino-Platonic Paper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19104-6305 USA
vmair@sas.upenn.edu
www.sino-platonic.org

SINO-PLATONIC PAPERS is an occasional series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purpose of the series is to make available to specialists and the interested public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that, because of its unconventional or controversial nature, might otherwise go unpublished. The editor actively encourages younger, not yet well established, scholars and independent authors to submit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Contributions in any of the major scholarly language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Romanized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MSM) and Japanese, are acceptable.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papers written in one of the Sinitic topolects (*fangyan*) may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Although the chief focus of *Sino-Platonic Papers* is on the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of China with other peoples, challenging and creative studies on a wide variety of philological subjects will be entertained. This series is **not** the place for safe, sober, and stodgy presentations. *Sino-Platonic Papers* prefers lively work that, while taking reasonable risks to advance the field, capitalizes on brilliant new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he only style-sheet we honor is that of consistency. Where possible, we prefer the usages of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Sinographs (*hanzi*, also called tetragraphs [*fangkuaizi*]) and other unusual symbols should be kept to an absolute minimum. *Sino-Platonic Papers* emphasizes substance over form.

Submissions are regularly sent out to be refereed and extensive editorial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may be offered. Manuscripts should be double-spaced with wide margins and submitted in duplicate. A set of "Instructions for Authors" may be obtained by contacting the editor.

Ideally, the final draft should be a neat, clear camera-ready copy with high black-and-white contrast.

Sino-Platonic Papers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5 License.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se, visit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 or send a letter to Creative Commons, 543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5, USA.

Please note: When the editor goes on an expedition or research trip, all operations (including filling orders) may temporarily cease for up to two or three months at a time.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ose who wish to purchase various issues of *SPP* are requested to wait patiently until he returns. If issues are urgently needed while the editor is away, they may be requested through Interlibrary Loan.

N.B.: Beginning with issue no. 171, *Sino-Platonic Papers* has been published electronically on the Web. Issues from no. 1 to no. 170, however, will continue to be sold as paper copies until our stock runs out, after which they too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the Web at www.sino-platonic.org.

關於吐火羅人的起源和遷徙問題

徐文堪

吐火羅語是二十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發現的用中亞婆羅謎字母書寫的印歐語系的語言，有 A、B 兩種差別相當大的方言。初發現時根據回紇文佛教劇本《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 即 Maitreya samitinātaka) 的題識^①，定名為吐火羅語。後來逐漸有人提出異議，遂將吐魯番、焉耆一帶殘卷所代表的方言定名為焉耆語，而將庫車一帶殘卷所代表的方言定名為龜茲語。這一結論現已為多數學者所接受^②。但是，1958 年發表了 Vorob'ev-Desjatovskij 考釋的一件藏於原列寧格勒的吐火羅語 B——梵語合璧文書，其中以梵語 Tokhārikā 對龜茲語的 kucāñ-ñe isçake^③，所以有的學者仍主張保留吐火羅語這一名稱^④。與吐火羅語的命名密切相關的一系列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也是數十年來中外學者熱烈討論的對象^⑤。不過，操這種屬 Centum 語組的相當古老的印歐語（“一百”在吐火羅語 A 作 kānt，在吐火羅語 B 作 kante、kānte）的吐火羅人的起源問題，却一直是個未解之謎。依靠現代歷史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和遺傳學的新的研究成果，我們是否可以解開這個謎呢？

現存吐火羅語文獻的年代約為公元六——八世紀，但是，正如 T. Burrow 和 H. W. Bailey 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的^⑥，用法盧文書寫的尼雅俗語中有很多語法現象和詞匯接近於吐火羅語，所以，鄯善國的居民原來說的是一種與後來的焉耆——龜茲語有些不同的吐火羅語，也就是說，存在吐火羅語的第三種方言。這說明，吐火羅人進入塔里木盆地可以提早到公元二——三世紀。

在漢文歷史記載裏，可以與吐火羅人聯繫起來的還有“月氏”。一般認為，“月氏”之名已見於先秦典籍，如《逸周書·王會篇》（《伊尹朝獻》作“月氏”）和《管子》中《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各篇的“禺氏”（《地數篇》作“牛氏”），《穆天子傳》的“禺知”是指月氏。由於對《管子·輕重》諸篇的著作年代尚有爭議，或主戰國，或主西漢，這裏不擬予以討論^⑦。但可以確知的是，當秦漢之際，月氏為中國古代北方三大民族——東胡、匈奴、月氏之一，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故其活動範圍可自塔里木盆地直至鄂爾多斯草原。西遷之前月氏人的活動中心，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麓^⑧。

關於月氏的族屬和語言問題，自十九世紀以來眾說紛紜，但目前除少數學者還主張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說^⑨、漢藏語系的羌氏之類說^⑩外，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肯定月氏為一種說印歐語的古代民族^⑪。但是，在月氏究竟說印歐語系的伊朗語還是吐火羅語的問題上，仍然存在爭論。

B. Laufer 1917 年出版《月氏語言考》^⑫，考證了見於漢籍的月氏語詞，即“師”（“獅”）、“符

拔”、“及”(《太平寰宇記》卷八十引《玄中記》，按《太平御覽》卷九百引作“反牛”)、“翕(翮)侯”以及貴霜王名如 Kaniska、Huvisa 的後綴 *ška*，還討論了“月氏”這一族稱，得出的結論是月氏語應與斯基泰語、粟特語、奧塞特語(Ossetian)和雅格諾布語(Yagnobi)同屬一系。H. W. Bailey 在數十年中也一再論證“月氏”這一名稱的原型是伊朗語詞，月氏——吐火羅人所操的語言應屬伊朗語。

但是，自六、七十年代以來，多數學者都主張月氏是吐火羅人的一支^⑬。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在1966年發表的著名論文^⑭裏，曾對一些與月氏有關的名稱進行分析，指出其中有吐火羅語的詞匯，還舉出漢文古籍中的一些詞，作為說明吐火羅語影響的例證，其間雖不無可商之處，但漢人與吐火羅——月氏人的接觸甚早，却是完全可能的。漢語的“師(獅)子”，可能來源於伊朗語(如粟特語為 *šryw*，花刺子模語為 *sary*，和闐語為 *sarau*，安息語為 *šarg*，中古波斯語為 *šagr*)，但也可能與吐火羅語 A *šecake* 或吐火羅語 B *šisäk* 有關^⑮。“翕侯”的原型也可解釋為是吐火羅語(焉耆語 *yapoy*，龜茲語 *ype*，意為“土地、國家”)。至於貴霜王名中的後綴 *ška*，據 V. V. Ivanov 研究，亦源於龜茲語^⑯。我們以為，渡過阿姆河攻佔巴克特里亞(大夏)的月氏是個部落聯盟，以吐火羅人為主，但在西遷過程中也混雜了說東伊朗語的塞人各部，甚至原來還可能有些阿爾泰語部族乃至羌族的成分。即使 Laufer 對月氏語的研究結論能夠成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那些語匯實際上是月氏統治下的伊朗語各部的語言。

貴霜王國境內曾使用多種語言，但其創建者原來的語言是吐火羅語，近來也有一些新的線索。早在1947年，季羨林就作了考證^⑰，認為漢語“佛”不是直接譯自梵語 *buddha*，而是可能來源於吐火羅語，如焉耆語 *pät-*，龜茲語 *pud-* 或 *pūd-*。但按高本漢(B. Karlgren)的構擬，佛的古音 *b'iwət/b'iuət* 是以濁音起始的，而在吐火羅語中都是清音。所以，這個問題還未最後解決。1970年，德國學者 Bernhard 支持季先生的假設^⑱，認為“佛”譯自較吐火羅語 A、B 更早的一種吐火羅語方言的 **but*(參考吐火羅語 B *pudñakte*，吐火羅 A *ptānkāt*)。蒲立本也認為“佛”的原型是 *but*^⑲。1979年，古都西安的一處遺址曾出土一件小的銅坐佛，底部刻有佉盧文一行。據林梅村考釋研究^⑳，其時代不晚於四世紀末，出於自二世紀中葉以降大量流寓中國的貴霜月氏移民之手。值得注意的是，銘文中有“佛”一詞，寫作 *buca*。在吐火羅語裏，*t* 變成 *c* 是一個顯著特徵，此種現象亦見於前述佉盧文書的吐火羅語底層。所以，這個 *buca* 應是月氏人所用的吐火羅語詞。

1976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發掘的一座西周墓的出土物中有一青銅戟，戟上的人頭像具有明顯的白種人特徵，類似的頭像還見於1980年在陝西扶風一處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兩件蚌雕，其中一號頭像完整，頭頂刻有一個“巫”(卍)字。以上三例表現的白種人，有人認為就是吐火羅——月氏人^㉑。西周蚌雕人頭像也引起了饒宗頤^㉒和美國學者梅維恒(Victor H. Mair)^㉓的注意和重視。這些雕像所表現的白種人的族屬究竟是什麼，現在還難下結論，除可能與吐火羅人有關外，也可能是中國古代的伊朗語族人。

我們認為，研究吐火羅人起源的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是新疆出土的人骨和古屍。例如，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距離現已乾涸的羅布泊湖以西約七十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臺地沙丘上，發掘了四十二座古代墓葬，從中採集到一批頭骨。墓葬年代屬青銅時代，距今約三千多年。根據對人骨的人類學特徵的研究，古墓溝文化居民同南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伏爾加河下游草原和鹹海沿岸的青銅時代居民具有一般相近的原始歐洲人種特性，其頭骨形態與諾的克(Nordic)即北歐類型有許多相似之處^㉔。原始歐洲人類型之外，新疆還發現了地中海(印度

——阿富汗人種類型和帕米爾·費爾幹人種類型的白種人遺骨²⁵。古樓蘭居民的主體屬歐洲人種印度——阿富汗類型，與古墓溝文化遺址的居民具有不同的種族起源關係，在時代上，後者也早於前者。所以，古墓溝文化居民是迄今所知歐亞大陸上的時代最早、分佈位置最東的古歐洲人類型。我們是否可以據此推測，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白種人與後來的吐火羅人之間有某種淵源關係呢？我想，這方面的研究的前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也是很有希望的。

二

討論吐火羅人的來源，必然要涉及吐火羅語在印歐語系中的地位和與非印歐語的關係。

從本世紀初以來的八十多年裏，各國語言學家對此提出了多種假設。H. Pedersen 先認為吐火羅語與意大利——凱爾特語關係密切，後又主張將意大利——凱爾特語、弗立基亞語 (Phrygian)、赫梯語和吐火羅語歸屬於同一個語組。A. Meillet 以為吐火羅語處在以意大利——凱爾特語為一方和斯拉夫語同亞美尼亞語為另一方之間的過渡地位。J. Pokorny 企圖證明吐火羅語首先與色雷斯語 (Thracian) 和弗立基亞語有密切的親緣關係，其次與亞美尼亞語和波羅的——斯拉夫語有關係，第三與日耳曼語有關係。E. Hermann 認為吐火羅語與弗立基亞語關係密切，而弗立基亞語的地位則處於吐火羅語與亞美尼亞語之間。E. Benveniste 在 1936 年發表的著名論文²⁶裏提出，吐火羅語的地位處在意大利——凱爾特語為一方與希臘——亞美尼亞語為另一方之間；它與赫梯語一樣，是史前時期的古代語言之一，一方面與波羅的——斯拉夫語相鄰，另一方面又同希臘語、亞美尼亞語跟色雷斯——弗立基亞語鄰近。進入五十年代，W. Porzig 認為，吐火羅語與波羅的——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的關係最密切，與希臘語和色雷斯——弗立基亞語的關係則相對較疏。V. I. Georgiev 則着重論證了吐火羅語與波羅的——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之間的關係，認為波羅的——斯拉夫語、日耳曼語和吐火羅語共同構成了印歐語的北支²⁷。

George S. Lane 於 1970 年發表的文章²⁸，在 Benveniste 論文的基礎上，對吐火羅語與諸印歐語和非印歐語的關係重新作了探索。在印歐語方面，他考察了吐火羅語與意大利、凱爾特、日耳曼和斯拉夫語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吐火羅語原處於波羅的——斯拉夫語與希臘——亞美尼亞語之間的地位，後來又與意大利——凱爾特語和再度與斯拉夫語發生接觸，而和日耳曼語並沒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在非印歐語方面，作者指出了芬——烏格里安語對吐火羅語的影響，這種語言間的接觸發生在吐火羅人東遷之前，地點在今俄羅斯中部的某些地方。

D. Q. Adams 1984 年發表的文章²⁹，從音位、形態、詞匯等方面，特別是用統計方法研究了吐火羅語詞匯與其他印歐語的相似程度，得出了吐火羅語同日耳曼語最為接近的結論。此外，它與希臘語、印度——伊朗語（特別是印度語）也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與波羅的語的關係則相對少些，再次是斯拉夫語和拉丁語。在此之前，Van Windekens 的研究³⁰也有類似的認識。Adams 認為可以把吐火羅語歸入印歐語系的西北語組 (A. Meillet 所提出)，它在原始印歐語世界中與先日耳曼語 (pre-Germanic) 為鄰，以後，隨着原始印歐語共同體的解體及其各個分支的遷徙，吐火羅語向南和向東運動，與希臘語的祖先 (可能在巴爾幹北部) 和印度——伊朗語的祖先有了關係。再往後，吐火羅人到達我國新疆等西北地區，又跟東伊朗語各族發生了語言接觸。

近年來，前蘇聯語言學家 T. V. Gamkrelidze 和 V. V. Ivanov 力主印歐語和印歐人的故鄉在中東的新說。他們認為，吐火羅語在印歐語系中同安納托里亞語（赫梯語、魯維語等）、凱爾特語、古意大利語組成一個方言區^①。安納托里亞語首先從該方言區分離，接着留下的吐火羅——古意大利——凱爾特方言共同體進一步分解為吐火羅語和古意大利——凱爾特語共同體。吐火羅語分離之後，又與分離時間更早的原始安納托里亞語發生了長時期的接觸。最後，吐火羅語諸部從中東開始了他們的長途遠徙，經歷許多地區而最終到達中亞。

吐火羅語在史前時期與芬——烏格里安語有相互影響和借用的關係，這種語言關係可能發生在公元前第二千紀早期，地點在鹹海和南烏拉爾之間^②。吐火羅語與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據 N. A. Baskakov 研究^③，有一定數量的突厥語詞匯源於吐火羅語，如突厥語的 kün~gün（日）來自吐火羅語 A 的 koni~kom，吐火羅語 B 的 kaum~kom；突厥語的 tümen “萬”來自吐火羅語 A 的 tman，吐火羅語 B 的 tumane~tmane，等等。吐火羅語與達羅毗荼語之間有共同點，這可以從銅器時代中亞細亞南部居民說一種達羅毗荼語的假設中得到解釋^④。

由於眾說紛紜，對吐火羅語在印歐語系中的地位這樣一個大問題，現在還不能做出肯定的結論^⑤。但從多年的討論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認識，那就是：吐火羅語的發祥地可能在歐洲，它是一種古老的印歐語，脫離印歐共同體的時間相當早，在操這種語言的部族到達我國新疆等西北地區之前，曾有過長途遠徙的歷史，在此過程中，它又與許多印歐語和非印歐語發生接觸；即使像有些人所主張的那樣，吐火羅人起源於中東，但他們在遷到我國西北之前，也必然經過了歐亞大陸的遼闊地區。

三

作為印歐人的一支，研究吐火羅人的起源問題必然涉及印歐人的起源問題。

自十九世紀以來，印歐語言學者不斷嘗試尋找原始印歐語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時的根據地，即通常所說的“印歐語故鄉”（Urheimat）^⑥。在比較語言學發展的早期，由於當時認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歐語是梵語，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視為印歐語的發祥地。以後，又有人將亞洲其他地區看作印歐語的搖籃。英國人 R. G. Latham 首先提出印歐語應發源於歐洲的看法。以後經多年研究，雖仍有人主張印歐母語起源於亞洲，但多數學者似已傾向於歐洲起源說了。

確定印歐人居住地，比較語言學家多採用語言古生物學（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謂語言古生物學，就是通過對印歐語系中各語族語言的分析、比較和復原，發現這些語族在其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語，並進而詳細分析這種母語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從而探討使用這種母語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 Paul Thieme^⑦的說法，印歐語“鮭魚”一詞是原始印歐人發祥地的有力證據。這種魚來自南大西洋，成群結隊地游進注入波羅的海和北海的河流裏，至今還以其原始意義存在於俄國、波羅的海各國、斯堪的那維亞和德國。根據共同日耳曼語 *lax 和波羅的語 laszisz，可以構擬出原始印歐語 *laks。在吐火羅語裏有 laxs 一詞，泛指一般的魚類。但在印度——伊朗語裏，情況有些不同，如梵語 lakṣa 的意思是“巨量”或“萬”，這說明有“鮭魚”或“鮭魚群”之義的詞在移入印度的印歐人忘記這種魚之後意義有了變化和引伸，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數量或密度著稱的事物的名稱表示很大數量的類似例子，如埃及聖書以蝌蚪表示“萬”，漢語以“蟻”表示大量，伊朗語的“萬”植根於“蜂”等等。所

以，原始印歐人的聚集地應是在北日耳曼地區，也就是中歐和東歐偏北的地方。

但是，語言古生物學的方法也有相當大的局限性。現在在探尋印歐語故鄉時，除了語言古生物學，還廣泛採用比較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法。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考古學材料越來越受到重視。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學家V. G. Childe (1892—1957)就指出了烏克蘭黑海北岸草原地區可能是印歐人的故鄉³⁹。到了本世紀五十年代，Marija Gimbutas提出了著名的“庫爾幹”(Kurgan)理論⁴⁰。所謂Kurgan，原是個借自突厥語的俄語詞，意為“古墳”。Gimbutas在1956年首先使用這個術語，用以指稱從黑海地區到北高加索，到伏爾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區，以至西伯利亞葉尼塞地區，時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2500年間的半游牧文化。這種文化具有比較先進的武器，採用豎穴式墓坑，飼養馬匹，也已有了農耕，其社會組織是層級式的，實行父權製。庫爾幹文化即原始印歐人的文化，其擴散和滲入各地可分為三個階段：(1)公元前4300~4200年；(2)公元前3700~3500年；(3)公元前3100~2900年，並逐漸取得了優勢。第一階段的原始印歐人來自伏爾加河草原；第二階段來自德聶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脈之間的黑海北岸地區，文化更為先進；第三階段又來自伏爾加草原。而在庫爾幹文化之前，歐洲還存在一種古老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6000年至3000年間)，屬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其居民說的不是印歐語。在有關印歐語和印歐人發祥地的各種假設中，庫爾幹或南俄草原起源說是影響較大的。Gimbutas也曾就吐火羅人的起源問題與奧地利民族學家Robert Heine-Geldern進行討論⁴¹。按她的說法，原始吐火羅人可能起源於中歐，約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東遷，與此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應是青銅時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甕文化。

至八十年代，在印歐語和印歐人起源研究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說。T. V. Gamkrelidze和V. V. Ivanov主要依據語言資料，主張印歐人的故鄉是在中近東。按照這個新理論，原始印歐人是在公元前5000—4000年生活在東安納托里亞、南高加索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與說原始閃語、原始卡爾特維里語的各族為鄰，可能和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有關。1984年，他們的巨著《印歐語和印歐人》出版⁴²，系統地闡述了這一觀點。稍後，英國考古學家Colin Renfrew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學與語言》⁴³，這是一本依據“新考古學”的文化過程理論，結合歷史語言學，從新的角度探討印歐人起源問題的專著。作者一反過去認為印歐語是由橫跨廣闊區域的移居游牧民傳播的舊說，認為農業的逐步擴展是印歐語擴散的最基本的途徑。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從約旦河谷穿過東安納托里亞到美索不達米亞這個弧形地帶，發展起第一個農業經濟區域，印歐語隨着其主要傳播者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逐漸傳播，並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獵者和採集者的語言。他所主張的印歐人的故鄉是在中安納托里亞，接近兩位前蘇聯學者的說法。

另一位前蘇聯東方學家I. M. Diakonoff於1982年發表長文⁴⁴，不讚成印歐人起源於中近東的論點，提出印歐人的故鄉是在巴爾幹——喀爾巴阡地區。但他又指出，該地區的動物馴養和農業出現於公元前6000—5000年，應該是來自小亞的，因此，小亞Çatal-Hüyük文化地區可能是當地農民和家畜飼養者的故鄉，不過印歐語的傳播是始於巴爾幹——喀爾巴阡地區，而不是始於近東和小亞的。

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著影響很大，在學界引起強烈的震動和熱烈的爭論。自八十年代末以來，這個討論一直在繼續⁴⁵。

除有代表性的Kurgan起源論和中近東起源論外，Lothar Kilian則認為印歐人的發祥地

是歐洲從北海直到烏克蘭的廣大地域^④，並將早期共同印歐語的年代推到公元前 10000 年，將共同印歐語分化和晚期印歐語開始的年代定為公元前 5000 年或 4000 年，各個個別印歐語的出現則定為始於公元前 2000 年。

近年來，中國學者也已開始注意印歐人的起源問題^⑤。特別是最近有人研究了 RFLP (限制性片段長途多態性) 與人類三大種族間和種族內的演變^⑥，在分子水平上討論了 Renfrew 關於印歐人起源於近東地區的假說。

研究印歐語起源的學者對吐火羅語資料都很重視。Gamkrelidze 和 Ivanov 在論證印歐人的故鄉在中東之後，特地撰文討論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的起源 (1989)，前面已略有涉及。

在這之前約十年，著名伊朗學家 W. B. Henning (1908—1967) 的遺作《歷史上最最初的印歐人》於 1978 年發表^⑦。他將吐火羅人與楔形文字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 (Guti，加上阿卡德語的格尾音就成了 Gutium 等形式) 等同起來。巴比倫統治者 Narâm-Sin 敗於來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們主宰整個巴比倫約達百年之久 (公元前 2100 年左右)，但其來歷不清楚。Henning 肯定 Gutu 人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同時，他還研究了古提人與楔形文字材料中的 Tukriš 人之間的關係。Tukriš 末尾的噤音可能是當地語言的格尾音，所以實際上的詞干是 Tukri，其居住地從東面和東南面鄰接 Gutu 人的區域。作者假定 Tukri 和 Gutu 是兩個關係緊密的兄弟部族；他們在公元前三千紀之末離開波斯西部，經過長途跋涉到了中國，其中一部分定居下來，其他的仍過着游牧生活，是即中國史書記載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終來源於 Gutu (kuči 這個名稱也是由 Gutu 變來的)，“吐火羅”一名最終來源於 tukri。Gutu 和 Tukri 這對孿生兄弟之所以被稱為歷史上最最初的印歐人，是因為他們很早就見諸中近東的歷史記載，甚至先於小亞的赫梯人。Gamkrelidze 等於 1986 年看到此文後，深受啓發，發展了 Henning 之說，進一步肯定公元前三千年前吐火羅人已居住在近東。吐火羅語與“古歐洲”方言 (包括凱爾特——意大利語、伊利里亞語、日耳曼語和波羅的——斯拉夫語) 組成語言聯盟 (Sprachbund)，共同從近東的故鄉遷往中亞的廣闊地區。在中亞北部地區及該地區的北面和東面各地，吐火羅語與原始突厥語、芬——烏格里安語發生接觸，這種接觸延續至公元前二千紀與一千紀之交。以後，又與東伊朗語、漢語、原始藏語以及南亞語系諸語言、阿爾泰語系諸語言 (包括朝鮮語) 發生接觸，最後在中國新疆留下了屬公元六——八世紀的文獻。

的 對於這些說法，我們傾向於認為印歐人的故鄉在以黑海北岸為中心，向西伸展到多瑙河流域，向東伸展到裏海沿岸，包括南俄第聶伯河和頓河流域在內的地帶。考古學家 S. Piggott 曾說早期印歐語居民的住地在喀爾巴阡和南俄平原之間^⑧。David W. Anthony 在 1986 年撰文討論 Kurgan 理論^⑨，提出印歐人的故鄉是公元前四千年後半期的里沃夫——基輔地帶，那裏是連接中歐和南俄草原的通道。這些意見都值得認真考慮。

至於吐火羅人的原住地，現在也還不能完全確定。W. Krause 設想吐火羅人原分布在第聶伯河與烏拉爾之間的地區，與芬——烏格里安人為鄰。Lane 認為吐火羅人大約於公元前第二千年從俄國歐洲部分東遷，與此有關的考古學遺存是 Fatjanovó 文化。Adams 主張吐火羅語所屬的印歐語系西北語組分布於喀爾巴阡之北，易北河與德涅斯特河之間。吐火羅人很早就從這個語組中分離出來，向南或向東移動，大約於公元前第三千年上半期在莫爾達維亞或其鄰近地區與希臘人發生接觸，並且先於希臘人到達巴爾幹。然後，吐火羅人繼續東進，越過黑海草原與中亞草原，又與先希臘人發生接觸，並逐漸到達了新疆。

有的學者將古典作家記載的 Cimmericians 與吐火羅人等同起來，如 Heine-Geldern 在

1951年發表的一文常被人引用^①。作者認為與歐洲的哈爾斯塔特文化(Halstatt culture)有關的部族曾在古代大舉向東遷移,大約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游地區、俄羅斯南部和東部及高加索到達中國,即中國史書記載的“獯狁”,他們與後來的吐火羅人有關連。西方人的到來曾給遠東以至東南亞的文明(如印度支那東北部的東山文化)以重大影響。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從。根據Diakonoff的研究^②,Cimmerians不是族稱,而是指一個由歐亞草原游牧民組成的,說伊朗語的,機動且騎馬的軍士群體,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東都找不到可以與斯基泰人(Scythians)相區別的Cimmerians的物質遺存。從這裏也可看出,Cimmerians是不大可能說吐火羅語的。

對吐火羅人的起源,佛教史學家A. K. Narain又提出了新的看法^③。作者論證了我國古代的月氏人就是西方記載中的Tochari人和印度典籍中的tuṣāra人或tukhāra人,貴霜王國實際上就是大月氏國家。但他不讚成吐火羅——月氏人西來說,也不同意Henning所主張的Guti=月氏的新說,認為月氏很早就住在中國境內;是中國古代北方的一個重要民族,並力圖將主要分佈在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與吐火羅——月氏人聯繫起來,還推測仰韶文化也可能與吐火羅——月氏人有關。不僅如此,他還進而認為印歐人也可能源於中國,吐火羅——月氏人是“最初的”印歐人的一支,也是最後離開故鄉的。與吐火羅人同屬“最初的”印歐人的還有赫梯人和說Centum語組語言的各支,他們先後在公元前三千紀至二千紀西遷。居住在“最初的”印歐人西邊的是“較晚的”印歐人(“Second”Indo-Europeans),他們包括伊朗語各族,還有其他說Satem語組語言的各支。這樣,我國北方就成了吐火羅——月氏人和印歐人的“搖籃”。

我們認為,將吐火羅人和月氏人聯繫起來,這種看法可取。但把齊家文化說成吐火羅人和“最初的”印歐人的文化,至少就目前而言,在考古學上無法證實。可以與月氏相聯係的文化遺存,現在還未能確定。對新疆、河西以至鄂爾多斯的吐火羅——月氏文化遺存的確認,尚有待於未來的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研究的新成果。

此外,C. A. Winters於八十至九十年代初連續發表文章^④,提出了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起源於達羅毗荼人的說法。作者肯定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創造者是達羅毗荼人,他們與中亞早就存在聯係,並控制了巴達赫尚等地的青金石礦區和錫的輸入。作者認為達羅毗荼人的故鄉在非洲,與非洲的曼丁人(Manding)關係緊密,他們於公元前三千年離開撒哈拉進入伊朗和亞洲各地。伊朗高原發現的最古的語言埃蘭語現已證明屬達羅毗荼語。這些達羅毗荼人和曼丁人的文化特徵是具有黑紅陶(BRW),這種黑紅陶從努比亞經美索不達米亞、伊朗到印度都有發現,其影響並且及於安諾和中國的仰韶文化。作者企圖從構詞法、語音和詞匯等方面說明達羅毗荼語、曼丁語與吐火羅語的相似性,從而證明吐火羅語中存在達羅毗荼語和曼丁語的底層。

吐火羅語中確實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印歐語的創新,這可能是由於它脫離印歐語共同體比較早並且長期與非印歐語接觸產生的(前已述及)。吐火羅人與達羅毗荼人有過一些聯係,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要說吐火羅語源於達羅毗荼語甚至曼丁語,在語言學和考古學方面都無從證明。所以,Winters的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起源的假說是很難成立的。

我們設想,吐火羅人可能起源於東歐或中歐稍偏北的地區,與波羅的——斯拉夫、日耳曼、凱爾特語諸族接觸較多,其東進的時間和具體過程則尚待進一步研究。Henning、Gamkrelidze、Ivanov等都是卓越的語言學家,他們關於“原始吐火羅人”=Guti,吐火羅人起源於西亞的

論文知識淹博，很有創造性，確有極新鮮的見解，但總的說來，還缺乏可靠的考古學和人類學材料的支持，目前還只能看作是一種尚待證明的假說。

在考古學材料方面，H. L. Thomas 推測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的一部分屬吐火羅人^⑤；J. P. Mallory 將阿法納西耶沃文化(Afanasyevo culture)與吐火羅人聯繫起來^⑥，認為吐火羅人從東歐開始進行了長達四千公裏的長途遷移；芬蘭學者楊虎嫩(Juha Janhunen)也認為吐火羅人在阿法納西耶沃文化時期已到達南西伯利亞^⑦；N. L. Chlenova 則將卡拉蘇克文化(Karasuk culture)的居民看作是吐火羅人的一支^⑧。這些論點也都是值得認真考慮的。

前已提及，中國新疆各地發現過不少具有明顯高加索人種即白種人特徵、保存完好的古屍，今後如果對地下埋藏的古屍進行科學的發掘和研究，相信對吐火羅人以至整個印歐人起源問題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遺傳學家 L. Cavalli-Sforza 將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技術和方法用於人種和語言起源的研究，“測量”各族人民間的親緣關係^⑨，這是我們應該密切注意的。

在語言學方面，近年對史前語言的構擬和研究取得了很多進展^⑩。有學者指出，吐火羅語材料在原始印歐語的構擬中起着關鍵的作用^⑪。我們也應該探討這些新成就和新方法。

展望未來，進行多方面的、跨學科的研究和國際合作，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起源之謎是能夠解開的。

注釋：

- ① F. W. K. Müller u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1916, 414.
- ② 耿世民、張廣達《唆里迷考》，《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156頁。
- ③ 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6, Ленинград, 1958, 304—308. 參看 H. W. Bailey, *Tokharika*, JRAS, 1970.
- ④ W. Thomas, *Zu st. tokharika und seiner Entsprechung im Tocharisch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5, 1, 1981.
- ⑤ 王靜如《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中德學誌》第5卷第1—2期，1943年；黃盛璋《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西域史論叢》第2期，烏魯木齊，1985年。
- ⑥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35; H. W. Bailey, *Taugara*, BSOS, 8, 1937.
- ⑦ 杜正勝《關於〈管子·輕重〉諸篇的年代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9本第4分，1988年。
- ⑧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1992年，55頁。
- ⑨ 蘇北海《大月氏的西遷及其活動》，《新疆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34頁。
- ⑩ 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銀川，1988年，72頁；楊建新、馬曼麗主編《西北民族關係史》，北京，1990年，48頁。
- ⑪ 參看前引《塞種史研究》，63—64頁。
- ⑫ Berthold Laufer,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1917.
- ⑬ 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國古代的印歐語和印歐人》，李錚等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南昌，1991年。
- ⑭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 1966.
- ⑮ 關於吐火羅語中“獅子”一詞的討論，請參看 E. C. Polomé, *Some Comments on the Etymology of Vedic simhāḥ 'lion'*, Hanjamana, ed. Subhadra Kumar Sen, Calcutta, 1989, 24—25. Adams 構擬的

原始印歐語形式是 *singheko-, 參看 Tocharian A śiśāk, B ṣecake, and the Proto-Indo-European Word for 'lio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7, 1984.

⑮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Языковые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уша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и тохар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АА*, 1967, 3, H. W. Bailey 和 W. B. Henning 則認為 Kaniska 一名是由詞根 Kan 加上後綴 -iška (-iška) 構成的, 意為“最富有青春活力”, 是讚美之詞。此名也可能是大夏語(巴克特里亞語)詞: *kaništaka > *kaništka > kaniška。參看 J. Brough, *Nugae Indo-Sericae*, W. B. Henning Memorial Volume, eds. M. Boyce and I. Gershevitch, London, 1970, 85—86.

⑯ 季羨林《浮屠與佛》,《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北京,1982年;《再論浮屠與佛》,《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⑰ F. Bernhard, *Gāndhāri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ñ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Presented to Oliver Hector de Alwis Wijesekera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1970, 59.

⑱ E. G. Pulleyblank, Stages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Indian Words from the Han to T'ang, *Sprache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 eds. K. Röhrborn, W. Veenker, Wiesbaden, 1983, 78. 關於“佛”一詞的討論, 可參看 W. Sunderman 的最新論著: *Manichaeism Traditions on the Date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ed. H. Bechert, Göttingen, 1991, 426—429.

⑳ Lin Meicun,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ang'an, 收入前引《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

㉑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文物》1989年第1期。請參看伊盛平《西周蚌雕人頭種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2期。

㉒ 饒宗頤《絲綢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問題》,《明報月刊》1990年9月號。

㉓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 1990.

㉔ 韓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學報》1986年第3期。

㉕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種族人類學研究和維吾爾族的體質特點》,《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㉖ Émile Benveniste, *Tocharien et Indo-Europée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Hirt, Vol II*, Heidelberg, 1936.

㉗ V. I. Georgiev,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Sofia, 1981, 297.

㉘ G. S. Lane, *Tocharian: Indo-European and Non-Indo-European Relationships*,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eds. Cardona, Hoenigswald, and Senn, Philadelphia, 1970.

㉙ 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 3, 1984.

㉚ A. J. van Windekens, *Le Tokharien confronté avec les autr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Vol. I: *La phonétique et le vocabulaire*, Louvain, 1976, 614—619.

㉛ П. В. Гамкрелдзе,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 1.

㉜ 參看 W. Krause, *Zur Frage nach dem nichtindogermanischen Substrat des Tocharisch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69, 3—4, 1951; V. V. Ivanov, *Tocharian and Ugrian*, *Studia linguistica, diachronica et synchronica: Werner Winter sexagenario anno MCMLXXXIII, quae redigenda curaverunt atque ediderunt Ursula Pieper et Gerhard Stickel*,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1985.

㉝ Н. А. Баскако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тохарских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х в лексик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Tatarica, Studia in honorem Ymär Daher anno MCMLXX sexagenario*, Vammala, 1987. 參看 G. Clauson, *Philology and Archaeology, Antiquity*, XLVII, 1973, 40—42.

㉞ 參看考古學家 V. M. Masson 發表在《古史通報》(ВДИ)1977年第4期上的文章。

㉟ W. Thomas, *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1960—1984)*, Stuttgart, 1985. 關於吐火羅語語

言學特別是語源學的進展情況，請參看 V. Blažek, *Tocharian Linguistics During Last 25 Years*, *Archiv Orientální*, 56, 1988.

③⑥ James Mallor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I, 1, 1973.

③⑦ Paul Thieme, *Die Heimat der Indogermanischen Gemeinsprache*, Wiesbaden, 1953. 請參看原載 *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1958) 的《印歐語》一文，漢譯文見王士元主編，游汝杰、潘悟雲等譯《語言和人類交際》，南寧，1987年，42—45頁。

③⑧ V. Gordon Childe, *The Aryans*, New York, 1926.

③⑨ 參看 M. Gimbutas, *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5th to the 3rd Millennia B. C.*, 見前引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155—98.

④⑩ M. Gimbutas, *Comments on Indo-Iranians and Tokharians: A Response to R. Heine-Gelder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1964.

④⑪ С.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раязыка и протокультуры*. Тбилиси, 1984.

④⑫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1987.

④⑬ 載于 *ВДИ*, 1982, 3—4, 已譯成英文: I. M. Diakonoff, *On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Speakers of Indo-European*,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13, 1&2, 1985.

④⑭ W. P. Lehmann, *The Current Thrust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General Linguistics*, 1990, 1. *When Worlds Collide: Indo-Europeans and Pre-Indo-Europeans*. eds. John Greppin and T. L. Markey, Ann Arbor, 1990.

④⑮ Lothar Kilian, *Zum Ursprung der Indogermanen*, Bonn, 1983.

④⑯ 陳有鏞《印度歐羅巴人的起源和擴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陳唯聲《古代印歐語系各族的起源、遷徙及其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北方論叢》1988年第5期；周流溪《印歐語言起源新說》，《外語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2期。

④⑰ 呂寶忠、陳捷、曾溢滔《RFLP與三大人種間和人種內分化演變的關係》，《人類學學報》第12卷第1期，1993年。

④⑱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ed. G. L. Ulmen, The Hague-Paris-New York, 1978.

④⑲ S. Piggott, *Approach to Archaeology*, London, 1959, 116.

④⑳ D. W. Anthony, *The 'Kurgan Culture,' 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se: A Reconsider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27, 1986. 這與 V. G. Childe 1957 年的看法一致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6th, London)。

⑤① Robert Heine-Geldern, *Das Tocharien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 *Saeculum* 2, 1951.

⑤② I. M. Diakonoff, *the Cimmericians*, *Acta Iranica*, 2e série VII, 1981, 132.

⑤③ A. K. Narain, *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2, Bloomington, IN, 1987;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 Denis Sinor, Cambridge, 1990.

⑤④ C. A. Winters, *The Dravidian and Manding Substratum in Tokharian*, *CAJ*, 32, 1988; *The Dravidio-Harappan Colonization of Central Asia*, *CAJ*, 34, 1990.

⑤⑤ H. L. Thomas, *Arch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Migrations of the Indo-Europeans*, *The Indo-Europeans in the Fourth and Third Millenia*, ed. Edgar C. Polomé, Ann Arbor, 1982, 81.

⑤⑥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1989, 262.

⑤⑦ Juha Janhunen, *On Early Indo-European-Samoyed Contact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

XU Wenkan, "Guanyu Tuhuoluoren de Qiyuan he Qiantu Wenti [On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the Tocharians]," *Sino-Platonic Papers*, 53 (November, 1994)

-Ougrienne 185, 1983, 116.

⑤⑧ Н. Л. Членова, Карасук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Улан Удэ, 1964. 參看 T. Sulimirski, *Prehistoric Russia*, London-New York, 1970, 308.

⑤⑨ L. L. Cavalli-Sforza, A. Piazza, P. Menozzi, and J. Mountain,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Bringing Together Genetic,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85, 1988.

⑥⑩ Vitaly Shevoroshkin, Alexis Manaster Ramer, Some Recent Work on the Remote Relations of Languages, 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 *Investigations into Pnehistory of Languages*, eds. Sydney M. Lamb and E. Douglas Mitchell; Stanford, 1991.

⑥⑪ D'ecsy Gyula, *The Indo-European Protolanguage: A Computational Reconstruction*, Bloomington, IN, 1991.

縮 寫 表

- CA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PAW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Phil.-hist. Klasse.
ВД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НАА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補記：

關於吐火羅語在印歐語系中的地位問題，並請參閱 D. A. Ringe, *Evidence for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in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Die Sprache - Zeitschrif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34, 1988-1990, 59-123. Penglin Wang 最近討論了吐火羅語與阿爾泰語的接觸，請參看他的 *On the Etymology of English silk: A Case Study of IE and Altaic Contact*, CAJ, 37, 3-4, 1993, 225-248.

Since June 2006, all new issues of *Sino-Platonic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electronically on the Web and are accessible to readers at no charge. Back issues are also being released periodically in e-editions, also free. For a complete catalog of *Sino-Platonic Papers*, with links to free issues, visit the *SPP* Web site.

www.sino-platonic.org